

dangdai cidianxue

当代词典学

章宜华 雍和明 著



商務印書館

H06/7

2007

当代词典学

章宜华 雍和明 著

商务印书馆

200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词典学/章宜华、雍和明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ISBN 978-7-100-05563-5

I. 当… II. 章… III. 词典学—研究 IV. H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 第 10889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DÀNGDÀI CÍDIǎNXUE

当代词典学

章宜华 雍和明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563-5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7%

印数 4 000 册

定价: 33.00 元

序 言

又一部词典学著作的稿子摆在我的案前,那是章宜华和雍和明两位教授合著的《当代词典学》。二位关于词典学的著述,以前我早有接触,并曾为之写过序言。我还记得的有:章宜华的《语义学与词典释义》(上海辞书出版社)、《计算词典学与新型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雍和明的《交际词典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他们各自“单枪匹马”执笔,都已推出显示作者才华的佳构。此次两人通力合作,我料想他们一定能写出更有分量的专著。果不其然,他们的《当代词典学》的确比迄今为止已出版的关于词典学通论的著作前进了一大步。此书在好几个方面都显示出其创新之处,我就简略地谈一下自己读后印象吧。

首先,《当代词典学》的“当代”之名是名副其实的。时下某些冠以“现代”或“当代”之名的著作,究其内容,老观点、旧知识的居多,其中没有多少“当代”的东西。本书归纳总结了世界范围内这方面的最新成果。其所借鉴的材料,牵涉多种语言,涉及多个国家,包含不少21世纪以后的著述。我认为,光是为了了解这一领域的新动态,本书也值得“开卷”展读,因为里面的确不乏前沿性的学术见解。

其次,《当代词典学》这“学”字,是当之无愧的。本书展示了现代语言学(含各个分支学科)对词典学理论构建的贡献,在这方面它大大超越了内省式的经验性之谈,为今后的分支深入研究点明了方向,因而具有无可置疑的理论价值。如此,它也就不同于某些取了什么

“学”之名的著作(例如 XX《秘书学》),其实是谈论“术”的居多,内中没有多少“学”的成分。本书关照到词典学各方面问题所作的理论思考,想必是有助于推动建立具有本国特色且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辞书学的。

再次,本书也并非纯然的理论探索,而是包含许多编纂工艺的说明,这正是辞书学有别于其他语言学科的一个重要之点。据我所知,章、雍二位著者也都同时从事词典编纂工作,而且都编过重要的辞书。无怪乎在《当代词典学》中,我们看不到某些理论著作的那种空疏之议、玄谈之弊。简言之,本书不仅有助于读者开阔视野,而且对于指导其编纂实践也会有切实的帮助。

章、雍二位都是外语教授,换言之,也都是“西学”出身的。搞“西学”的人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学术信息灵通,最新资料较易取得。我们稍稍翻阅本书便不难发现,《当代词典学》的两位著者是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的。如果我说,本书已“和国际接轨”,这也不算是夸大之辞。就本人的识见所及,在英、法两种文字同类的著述中,《当代词典学》列于其间,是丝毫不会显得逊色的。也就是说,本书综合、吸取世界智慧的程度颇高,足可以供直接接触外文机会不多的国人借鉴。

然而,搞“西学”的人或许也有一个短处:由于时间或经历所限,有时不免在某些问题上,对外国的十分熟谙,对本国反而知之不详。《当代词典学》是属于中外兼通的著作,并不存在明于外而昧于中的毛病;不过,在关照本国的辞书的现状方面,如果著者的笔墨能够更浓重一点,这一成果将会更为丰厚充实。

谨写此数语,聊作序言。

黄建华

2007年3月

前 言

本书定名为《当代词典学》，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词典界前辈胡明扬、黄建华等先生已有专著对我国传统词典的功能、类型、结构、体例和编纂方法等作了系统的阐述，没有必要花时间和精力再写类似的书；二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现了很多新的词典学现象，如积极型学习词典、能产型表达词典、认知概念词典、理论研究型词典、电子词典、网络词典，以及语料库和计算机辅助编纂等词典现代化技术；三是语言研究和语言学的发展对当代词典学的研究和词典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认知词典学、交际词典学、语篇词典学和比较词典学等新的词典学研究方法论应运而生。这些新的词典学现象都需要专门和系统的描写。

词典学发展至今已形成一门具有独立理论框架的交叉性应用学科，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词典编纂实践——应用词典学，二是词典编纂理论——理论词典学。理论词典学的任务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研究，从形式和内容上系统地描写词典学的理论框架，并不断地丰富它。当代词典学理论的特点是研究如何通过词典知识结构的组织来揭示自然语言词汇和语义之间的各种关系，在词典中构建系统的词汇和语义网络。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语言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支持和系统保障；内容包括词典的设计与编纂过程管理、词典的结构与体例、词典编纂的原则与规范、词典释义理论与方法、词典评价体系与原则、词典质量控制与修订、计算机辅助词典编纂与编排、

词典语料库与数据库、电子词典与网络词典,以及词典与用户、词典与社会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书旨在用新的语言学方法对词典学的各种理论观点及其功能和关系进行梳理和描写,尝试把当代词典学的各种新现象与传统词典学的框架有机结合起来,以构建系统的当代词典学理论体系。本书共有十六个章节,分为六个主题。

一、词典与词典学综论:阐述词典发展的源流、词典的属性与功能,明确词典学的基本任务、研究方向以及词典学与语言学的关系;探讨词典的内部结构、外部结构、宏观结构、微观结构和索引结构;梳理国内外主要词典分类学说,阐述分类原则,并从词典的交际视角出发构建词典的交际分类法。

二、词典的主要类型与功能特征:阐述语文词典的类型特征和信息特征,包括形态、语法、语义、语用和例证信息;探讨双语词典中两种语言的不对等现象与等值关系,以及双语词典的微观结构要素;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揭示专科词典的学术特征、结构特征、功能特征和类型特征。

三、词典的编纂原则与释义方法:提出词典编纂的总体原则以及收词原则、立目与注音原则和释义原则等;探讨哲学、逻辑学等相关学科的各种释义学说和释义方法及其在词典释义中的应用;阐述主流学习型词典的释义特征和多维释义的构想;探讨双语词典释义的性质、翻译原则及文化特色词的仿造翻译法。

四、词典修订与评价体系:阐述词典修订的动因、修订的形式、修订的内容、修订的程序和修订的周期;提出词典评价原则、方法,以及词典宏观质量和微观质量的评价体系等。

五、辞书的规划管理与编纂技术:阐述辞书发展规划和辞书设计方案的编制,以及辞书项目管理和词典编纂的实施流程;探讨词典

编纂的现代化技术及其应用,包括词典语料库和数据库技术、计算机辅助词典编纂技术和词典的自动生成技术等。

六、用户视角研究与词典使用:探讨词典编纂和使用与语言教学和学习之间的关系,以及词典与翻译之间的关系,阐述词典所提供的词汇信息、话语信息等翻译认知过程中的作用等。

本书以国际词典学的历史和现状为理论背景,以英、法等西方词典学的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汉语词典学的实际,尝试从多角度、全方位地描述当代词典学的理论体系。在写作中,为了能够揭示词典的复杂结构特征和属性,往往从词典类别的大范畴出发,引用多种词典进行描述。比如,在论述语文词典的例证功能时,我们不但使用了单语语文词典,而且也使用了双语语文词典,因为它是最复杂的语文词典之一,能全面反映语文词典的结构特征。此外,使用双语引例,既能让不熟悉外语的读者了解国外的词典学理论,又能方便他们的阅读。

为了方便读者检索书中的文献,引文中的外国作者一律在引文括注中使用原文拼写形式;对正文出现的外国作者则给出汉语译名。为了解决版面与方便阅读之间的矛盾,对书中出现的词典一般用全称,外文词典(除一些非常见词典外)一般不注原文名称,但在正文后设置有中外文词典名称对照表。在特定章节反复出现的词典,一般会使用缩略名称,但在每次使用之前都会交代出中文全称和缩写形式;一些只用作举例而不便在行文中说明其全称的词典,一般在例证后注出词典缩写名称,并用尾注的形式交代其全称。较简短的词典名称,直接用其全称。一些译自外语的词条或术语,一般会在第一次出现时配注原文;一些在文中有专门解释的术语,则是在相关章节交代原文,如“积极型词典”和“消极型词典”在第一章就出现了,但直到第三章第四节谈到这两个名称的来源时才提供原文标注。对来自各种

词典的引例,本书尽量保持原来的格式和风格,这样可能会造成书中各种例证的格式和名称不太一致;少数明显不太协调的地方,书中会有适当的改动,请予以谅解。

本书的写作跨越了5个年头。由于周期长、头绪多,而词典学发展快、变化多,这多少会使全书的系统性、连贯性受到影响。此外,由于本书涉及多种类型的词典,在写作过程中既要考虑全书的系统性,又要考虑各类词典的相对自主性,这可能会造成不同类型词典在结构和内容方面的信息多少有一些重复。为了尽量消除写作上的不足,作者与商务印书馆商定,成立了《当代词典学》审订委员会,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黄建华、伍谦光教授,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晁继周研究员、李志江副研究员,商务印书馆周洪波编审,上海辞书出版社徐祖友编审,香港中文大学陈善伟教授,厦门大学苏新春、吴建平教授,台湾东吴大学曾泰元博士等10位专家组成,负责对书稿进行审订。专家们在认真审读的基础上,各自对书稿作了必要的修改,并就书中一些理论观点和表述方法的修正、文字结构和段落的调整、内容和项目的增删、行文和注释格式的统一、专名和书名的处理方法等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书面意见。作者也在广州、北京和上海分别与相关专家们当面交换意见,讨论书稿的修改问题。专家们的认真态度和高度的学术责任心令作者备受鼓舞,专家们的宝贵意见或建议对丰富和完善《当代词典学》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项目的研究得到广东省高教规划项目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团队项目的资助(GW2006-TB-005);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夏立新、马立东两位老师对本书的文字作了认真的校对,石亚丽女士也做了许多文字和数据整理工作。在此谨对他们的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涉及的范围广、内容多,而自己的语言学和词典学等相关学

科的知识有限,书中一定会有一些考虑不周甚至是错误的地方,请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

章 宜 华

2007 年 1 月

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绪 论

词典是大家都熟悉的工具书,但词典是怎么来的,编纂词典有什么学问,选择和使用词典有什么讲究,这些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解答这些问题需要系统的跨学科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就是词典学的学问,也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解答好这些问题有助于构建和完善词典的理论体系。

词典编纂活动已经有 4000 多年的历史,郑述谱(2002)把各民族词典发展的历史过程分为三个类似的阶段,即词典前时期、词典初期和词典发达期。词典前时期的词典形式只是一种词表(glossary),主要任务是语词的翻译和难词的注释;词典初期的词典开始有了基本的词典构成要素和较系统的释义,主要任务是研究多民族的语言交流和同一民族语言中的标准表达方式;词典发达期的词典有完善的结构体系和系统的释义方法,学术界开始研究词典的编纂技巧和编纂理论。可见,词典编纂实践与词典学理论的形成并不是同步发展的。词典前时期的词典编纂活动也会考虑有关词表或词集的内容、结构和编排等问题,但这些思考还只是表层的、感性的和零碎的。词典初期的词典编纂活动会有一些对词典编纂经验的总结和继承,但并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国际范围内的词典发达期始于 18—19 世纪,但词典的研究并没有随词典的繁荣而同步发展;真正的词典理论研究发轫于 20 世纪初期,而把词典编纂作为一种科学来研究也只有几十年的历史。看来词典学界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是由来已久的,

正如兹古斯塔(Zgusta 1971:10)所说,“词典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词典编纂者很少相互交流他们的编纂经验……,对词典学理论和实践的系统讨论也很少。”

在中国,对词典的研究应该始于对古代经典词集的整理和校勘,有关的理论阐述仅见于序跋之类的文字;专门研究词典的论文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是著名语言学家沈兼士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2期上的《新文学与新字典》;词典学研究的繁荣时期应该始于1979年《辞书研究》的创刊。在西方国家,第一篇关于词典学的论文是由苏联著名语言学家、科学院院士谢尔巴(Shcherba)发表在《科学院通讯》(Izvestija Akademii Nauk)(SSSR, 1940, No. 3)上的《词典编纂学一般理论初探》,已由Farina翻译成英语发表在《国际词典学杂志》(1995, 8: 314—350)上。自Shcherba的论文问世以后就不断有关于词典学的论文发表。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的辞书在世界各地编纂出版,各类词典争奇斗艳。辞书编纂的繁荣给滞后的词典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来源和实践基础,成为系统地进行词典学理论研究和编纂实践研究的助推器。1950年,西班牙词典学家卡萨列斯出版了《现代词典编纂法引论》;1971年,捷克词典学家Zgusta出版了比较系统的词典学理论著作《词典学概论》。这标志着词典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已具雏形。1989年,豪斯曼(F. J. Hausmann)等四位学者合编的《国际词典学百科全书》问世,这不仅意味着词典学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基础已经比较坚实,更重要的是,它表明词典学的研究向成熟又迈进了一大步。在国内,胡明扬、谢自立等的《词典学概论》于1982年出版,黄建华的《词典论》于1983年开始在《辞书研究》连载,陈原的《辞书和信息》于1985年出版,钱剑夫的《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于1986年出版。这些词典学理论专著的出版拉开了词典学系

统理论建设的序幕,推动了词典编纂实践的发展。然而,词典学的学科建设并非一帆风顺,词典学的学科地位多少有些尴尬,词典学一直在夹缝中寻求生存。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词典学的发展。

在词典理论研究中有两个基本问题一直困扰着辞书界,并影响着词典学的学科建设:一是词典学有没有学问可做;二是词典学是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

词典学到底算不算一门科学?词典学到底是应该归属某一门学科,还是作为自成一体的独立学科?

传统观念认为,词汇学是理论学科,其主旨是对词汇进行全面的研究;词典学是应用学科,其目的是词典编纂;词典学是把词汇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应用到词典编纂中,词典学研究的只是经验性和技巧性的东西。西欧和美国的一些学者持这种观点,这可以从他们对“词典学”(lexicography)一词的释义中看得一清二楚。韦氏、牛津和朗文三大系列词典无一不是将“lexicography”释为“the writing and making of dictionaries/词典的编写和制作”或“the practice of compiling dictionaries/词典编纂实践”;而被部分语言学家和词典学家专门用来指称词典学理论研究的“metalexicography/元词典学”难以在词典中觅得踪影。相反,词汇学(lexicology)在这些词典的释义中却打上很深的“学科”烙印,如“the study of the form, meaning and behaviour of words/词的形式、意义和使用的研究”、“the study of the meaning and use of words/词的意义和使用的研究”。卡萨列斯(1950)明确指出,“lexicology”(词汇学)是从一般科学角度来研究词汇的,而“lexicography”(词典学)主要具有实用意义。(转引自郑述谱 1988)美国词典学家兰多(Landau 2001)在他的《词典编纂的艺术与技巧》一书中始终也没有把“lexicography”当作一种学问来对待,大多是一些词典编纂经验的总结和对词典编纂的感想。这在某种程

度上说明,在一些学者眼里“词典学”只是一种“技巧”和“艺术”,他们不愿意承认词典学是一门学问。

上述观点过于受到词典学传统本体意义的羁绊,对词典学的现代发展和词典学理论指导词典编纂的作用视而不见。我们承认,词典编写是有“技巧”或“艺术”的一面,但这只是词典学研究的一个侧面——词典编纂实践,主要涉及词典语料的采集,词项的选择、立目、释义,以及各类词典信息的组织和编排等。然而,为什么要这样做则包含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正如豪斯曼(Hausmann 1985)所指出,“词典学还包括对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与描述,这是词典学活动的基础”,是词典学作为一门学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认为应用科学没有学问也是十分片面的。事实上,词汇学和词典学之间的关系相当于理科(物理学)与工科(工程学)之间的关系。理科研究的是材料、能源和运动的一般规律;工科研究的是这些规律的工业应用,如铁路建设、桥梁建设、飞机制造、舰船制造,甚至是核武器的研制和核电站的建造等。这些工程的实施需要应用物理学的理论和原理,但谁能说飞机、原子弹和核电站的制造或建设没有理论呢?原子弹的研制和核电站的建造需要应用物理学对核原料的性质和裂变规律的研究成果,但如何实现制造或建设又需要系统的、完全抽象的理论,而且造原子弹的理论不一定能用来造核电站,反之亦然。这说明不同的应用理论虽然都基于同一种基础理论,但它们的应用实践又是完全具体的,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这些特点和规律就反映在它们各自的理论体系中。况且,物理学本身也分理论物理学和实验物理学,工程学也分为理论工程学和实践工程学。我们可以发现两种相对理论的交叉点:“科学—应用”和“理论—实践”。科学,以及它的应用都有其理论的一面和实践的一面,它们有着持久的相互反作用。

词汇学与物理学一样,有它的理论——自然语言词汇(包括心理

词库的词汇心理表征)的整体研究,也有它的实践——词汇的实验型描写,其最终结果必然要反映到词典上。如果说理论词汇学应该揭示词汇的各种规律,并提出形式化模型,那么实验词汇学的任务就是检验,并在对整体词汇进行描述中确定其描述形式,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一种理想的词典——实用词典的原型,这也是理论词汇学的检验平台和研究数据的主要来源。

然而,词典学像工程学一样也有其理论——对某一语言词汇作实际的、具体的专门研究。比如,词典应从哪些方面描述语言现实,词典应该如何诠释和呈现语言现实,词典如何评估和评论,词典如何反映用户的需求,词典如何适应教学的需求,双语词典如何处理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词典编纂如何利用现代化数字技术,词典如何参与市场竞争等。这些都是词典编纂应考虑或研究的理论问题,也是词汇学所忽视的问题。

词典学理论研究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对词典编纂方法和使用需求的研究来提高词典的编纂质量。这涉及对一切与词典编纂、使用有关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总结、整合、描写和评估,使词典理论和实践研究融汇到一个连贯的、科学的理论框架中。苏联学者也一直把词典学作为一种科学来研究,他们认为,词典编纂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它的理论是总结词典编纂实践艺术的科学。如果接受了“lexicography”只是“艺术”的观点,将会对词典编纂的理论与实践带来损害。(参见郑述谱 1988)事实上,经过国内外学者长期不懈的探索,词典学已经形成了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已经无可争议。

那么,词典学的理论体系是自成一体,还是附属于其他学科呢?国内学术界对词典学的学科定位一直存在分歧,有些学者认为它是独立的学科,有人则认为它应该与词汇学并列,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

支,部分语言学词典对词典学也这么定义。《辞书研究》曾在1990—1991年对这个问题组织了专题讨论,在连续9期中发表了20多篇论文。虽然当时没有形成明确的共识,但还是有一些倾向性的意见。陆嘉琦(1991)在对词典学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后认为:“辞书学的主要内容并不能包括在语言学的研究内容之中。”陈炳超(1991)认为:“虽然辞书学从其他学科(包括语言学在内)汲取研究手段和方法,但这些手段和方法毕竟只是实现目的的程式和方式,却改变不了辞书学的属性。”因此,我们可以说词典学运用了语言学原理和方法,但不是语言学的附属,更不是应用语言学的分支,就像语言哲学探讨语言学问题但不是语言学的分支、计算机学科运用了数学原理和方法但不是数学的分支、信息科学运用计算机原理和方法但不是计算机学科的分支一样。况且,词典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围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如基于用户视角的词典研究和编纂需要有认知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知识,双语词典的研究和编纂需要有跨文化交际和翻译学的知识,专科词典和百科全书的研究和编纂需要各类专业知识,术语词典涉及基于各专业学科科学研究和发现的专业术语命名及定义,专名词典涉及社会学和历史学方面的知识,辞书研究和编纂的现代化发展需要计算机技术,词典语料库和数据库的建设、管理和使用需要信息处理技术和统计学知识,电子词典的编纂需要多媒体技术和数字技术,还有辞书编纂过程需要确立编纂宗旨、总体规划、体例设计、用户调查、类型划分,以及选词、立目、释义、引例、索引、编排等。这些都是语言学所不能及的。这些“不仅无法依靠现有的语言学理论加以解决,而且也不能指望未来发展的语言学加以解决。”(郑述谱1990)正如哈特曼和詹姆斯(Hartmann 和 James 2000: F16)所说:“词典学常被误认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其实它是自成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它需要从信息科学、文献学、出版学、哲学、历史语言学、比较

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汲取营养。其相关学科,如术语学、词汇学、百科辞书编纂、目录学、术语符号学、索引学、信息技术、图书馆学、媒体研究、翻译学和语言教学以及诸如历史学、教育学和社会学之类的邻近学科为词典学家界定和发展自己的领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词典学已经形成一门自成一体、相对独立(而不是完全独立)的学科。说它“自成一体”,是因为:a)词典的本体性质及其理论和技术支持已经构成了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学科体系,明确了作为一门学科所要研究的对象、目标和任务;b)它有系统的学科设置,有成套的理论著作、教科书和学术刊物,已培养出一批词典学硕士生和博士生;c)有组织严密、分工细致的国际和国内的学会组织,有正常的学术活动,并在辞书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d)有一批常设的辞书研究、编纂和出版的机构,有一大批辞书从业人员。说它是“相对独立”,是因为:a)词典学的独立性只是相对而言的,因为词典学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它与各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离不开这些学科的理论、技术和方法论方面的支持;b)词典学经过数千年的实践和近一个世纪的理论构建,已经基本形成了作为一门学科应该具有的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但它仍必须不断从邻近学科、同类学科和相关学科中汲取营养,以求得自身的进一步发展;c)词典学已经在理论构架上形成了流派,在其内部形成了分支学科,词典学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构建词典学的理论框架,形成了基于范畴理论和语篇理论、认知理论和交际理论等的词典学流派,并由此派生出相应的分支学科。

近年来,国际范围内的词典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从事词典学研究和词典编纂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大学都开设了词典学课程或培养词典学研究生,这是一件好事。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另